



父亲抄写的家谱

“湖广填四川”前 川渝地区人烟稀少虎患严重 荣昌新知县走马上任 7个随从 被老虎吃掉5个

“湖广填四川”之前，川渝地区因连年战乱人烟稀少。据《四川通志》记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人烟稀少，带来的后果就是虎患极为严重。据清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了大规模战事的四川，仅余人口9万余人。康熙初年，针对四川“百里无烟”的状况，清廷颁布了一条基本国策：“俟三百户居民皆开垦，实授本县知县。”意思是说，只要你招揽到300户居民，朝廷当即封你为本县的知县。

兵荒马乱在康熙年间渐渐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腴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明清史志·户部题本》记录了他当时看见的情形，他说当他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为此，他建议“欲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

此后，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的康熙皇帝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而在移民“填川”之前，有关川渝地区虎患的史料记载，如今读来仍令人胆战心惊。

人口锐减、土地抛荒，客观上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恢复，但这又导致虎患爆发，本就饱受战乱和瘟疫折磨的百姓又要面临老虎的威胁。据清人赵彪在《谈虎》中记载：“……自春但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郡，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清顺治年间，南充知县黄梦卜向上级报告，南充招徕了人丁506人，结果后来被老虎吃掉228人，病死55人，仅存223人。黄梦卜又招徕了74人，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据《南充县志》记载，县衙门、学宫全部成了老虎洞窟。在顺庆（今南充）府和保宁（今阆中）府，甚至发生老虎成群结队游荡吃人的现象。清初文人沈蔚蔚在《蜀难叙略》中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春，“川南虎豹大为害，殆无虚口。”由于虎患太严重，移民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即使这样，还经常听说某州县的人几乎被老虎吃光，“如某州县民已食尽之报，往往见之。遗民之得免于刀兵饥馑疫疠者，又尽于虎矣。”

清康熙十年（1671），广安邓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邓绍祖在从广东返回四川途中，“为虎所食”。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荣昌知县张懋带着7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履新。当时，虽说正是春天，但驿道两旁田园荒芜，万户萧疏，由重庆府到荣昌的阡陌良田，已有近40年无人耕种，田里的树林绵延成森林。好在他率领的人除轿外，均是精壮汉子，熟操刀剑。一行人昼行暮宿，终于在第五天下午走进荣昌洞开的城门。时值黄昏，城内除野草残垣，竟无一个人影。张知县好生诧异，令军士敲门询问。门推开，哪知冲出的竟是一群老虎！众人大惊，一番血肉拼杀，2名军士力保知县逃出，其余5人则当即丧生！这一惊心动魄的往事，载于清《荣昌县志》第十九卷上。

广安人欧阳直在《蜀乱》中记载，“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只），或一二十（只），升楼上层，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有一年夏天，他乘船从宜宾去泸州，竟然见到两岸沙滩上有许多又肥又壮的老虎在晒太阳。船靠泸州时，又见数十只老虎“逍遥江边，鱼贯而行”。有一天夜行，在月光下遇到4只老虎，幸亏他藏在草间才幸免于难。据多本《巴县志》记载，从明万历十四年（1586）到清乾隆三年（1738），多次“入城”，跑进重庆城来“散步”。道光《重庆府志》记载：顺治三年（1646），“大疫患有虎患。重庆当流贼残杀之后，几无遗民。五年戊子大旱，群虎白日出游。”同期的江津、永川、綦江等地，也多有虎患记录，一些地方衙门甚至每天都接到老虎吃人的报告。

后世学者分析，当川渝地区森林之中的野兽不能填满华南虎硕大的胃口时，于是它们成群结队走出森林，前往村庄、城镇摄取食物。暨南大学历史系学者刘正刚在调查客家移民史时，对川渝虎患做过考证，认为虎患多以城镇为主，“这与陕晋地区虎患多发生在山区不同。陕晋虎患是流民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川渝虎患则因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难，反而使城镇空虚荒凉所致。”虽说古人的数据概念比较模糊，但我们还是能大致找到一个换算依据：四川人口从明末的380多万到清初的60万，总计减少约320万，如果将“死于瘟疫、虎”到“十之二三”进行折算，可知当时有三四万至八九十万人“死于瘟疫、虎”，如果再取其中间值，可基本推测死于虎患者在20万人到40万人之间。依据各类史料数据，专家们的基本结论是：当时，整个川渝地区的华南虎，总数不下一万只！

川渝虎患直到康熙末年才趋平缓，主要原因是“湖广填四川”而来的移民，在恢复生产、开垦荒地的过程中，捕杀了大量的华南虎。相对于成都平原老虎的消失，重庆山地的老虎存在时间更长一些。从清初到新中国成立前，重庆地区虽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垦，但华南虎的栖息地并未遭到毁灭性破坏。老虎最后一次现身重庆主城是1930年春，地点在金沙街原唐式遵公馆。唐时任川军32师师长，当天中午正在公馆内大宴宾客，忽然一只老虎越墙而入，客人惊恐躲藏，唐急取步枪射击，将虎击毙。次日，宴会继续，因有虎肉上桌，美其名曰“虎宴”。明末清初发生在川渝地区的虎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虎患，前后历时30年以上。

（本版稿件作者：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工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

“湖广填四川”尽人皆知，可你了解几百年前那场大规模移民浪潮的真实情况吗？下面这个家族的迁徙故事，为你呈现动乱年代的冰山一角——

1692年，我家填到合川来

□李正权

●父亲抄写的家谱

我家家谱是父亲抄写的。那时他可能不到20岁，还在四川合川（现重庆合川区）双河乡。双河乡位于合川北部，有两条小河，其交汇处形成一个小小乡场。我家家谱第一行就写着“凤凰溪系”，很可能得名于这两条小河。父亲只读过一年半书，是新式小学，成绩好，读一学期就跳一级，把五册班读完交不起学费就只有辍学。解放后单位上要定学历，于是拔高，竟然算为初小毕业。可能是辍学后在家有空，就抄写了这本家谱。在双河乡，李氏可谓大户，散布在方圆十几公里的丘陵之中。推测起来，家谱不可能像父亲抄写的这么简单。据父亲生前说，他只抄写了与我们这一房有关的一部分。人年轻、文化低，他也把握不准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哪些应该抄、哪些不应该抄，因此信息也就不完全，很多地方让人疑问重重，不得要领。家谱是用线装的宣纸书稿本抄写的，有蓝色油墨印的框，框线一粗一细，折缝处印有“文明开通”字样，还有“合川荣茂煊”字样，当然都是繁体。“荣茂煊”应该是商号名，也就是生产出售这种书稿本的商店名称。

父亲抄写的时间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书稿本共10页20面，后面三页是空白，空白页前3页也留有相应的空白地方。后来又在那空白处添加了一些内容，添加的当然都是后来发生的，例如母亲和我以及我兄弟的名字，那肯定是20世纪50年代添加的，有的甚至是70年代添加的，例如祖母1973年去世，是用钢笔添加的。从字迹看，后来添加的反而不如原来的字写得更好。父亲很小就下力，字怎能写好？添加的文字硬硬的，一看就知道是长期使用圆珠笔致使手指动作僵硬造成。

虽然信息不全，虽然粗糙，有总比没有好。几十年过去，家谱损坏较重，前几年我将内页拿去装裱之前，封面几乎已完全损坏。

●六十代字辈代代相传

我家是“湖广填四川”时来到重庆的。家谱首先标出的是李家的六十代字辈。父亲抄写时抄错了顺序，然后用一、二、三、四标出以示纠正。整理一下，这六十个字辈是：“逢春思宗祖，永远大明朝。国正乾坤定，英雄世代超……”有朋友听说了前面4句，立即判定：“这肯定是明末制订的。”的确，如果是“湖广填四川”时才制订这样的字辈，万一走漏风声，结局很可能是满门抄斩。清初，连写“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人都要杀头，何况“永远大明朝”！家谱上说：“四代祖思幸之子宗长，字康先，康熙州一年由胞伯思福负，自湖广黄州麻城

县孝感乡入川，插舌合川西里双河乡凤凰溪为业。”康熙卅一年是公元1692年。宗长入川，说明他前面还有“逢”“春”“思”三代人。平均每代人20年，倒推回去，第一代入川应该是1632年左右出生，因此制订字辈的时间应早于1632年。若以1632年为准，则是明崇祯五年，那年黄河于孟津决口，军民商死伤无数。同时，高迎祥、罗汝才、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势力渐大，驰骋陕西、山西。虽然1632年的南方可能还较为平静，但那怕穷乡僻壤，也应知道战乱已经开始，很可能受到波及。战乱是古代中国最大的灾难，远远超过天旱、水涝、瘟疫、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伴随而来的，就是逃难，就是分离，就是死亡。据《中国古代历史上的14次人口大灭绝》一文中说，明末混战使中国人口从1亿锐减为2000万，人口损失了80%。在战乱信息频传的日子里，先祖们可能开始惴惴不安，于是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古代中国的本质是家族社会，中国人都有浓重的家族情结，面对可能到来的家离子散，最简单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订字辈。同姓之人，字辈相同，又是同一祖籍，那肯定就是一家人了。用这样的方法来验证，有时可能比DNA还灵。战乱将至，可能家破人亡，可能天各一方，为了避免今后相见不相识，先祖们就制订了这个字辈。

●胞伯福负“填川”

据我所知，“湖广填四川”来到四川重庆的人家，几乎都有家谱，也都有相应的字辈，但大多只有20个字，一般不超过28个字，60个字的极少。即使一辈人20年，60个字辈至少也要管1200年。家谱上说，我家是“自湖广黄州麻城县孝感乡入川，插舌合川西里双河乡凤凰溪为业”的。如今的四川人重庆人，大多都是“湖广填四川”“填”来的。只要一问，大多都会说到孝感乡。不过，已有专家考证过，孝感乡仅仅只是一个移民中转站，说我家祖籍是麻城县孝感乡大约是有问题的。我家祖上是康熙卅一年“填”川的，那时“填”川虽然已经开始，但规模还不小。直到康熙卅三年，才正式颁布《招民填川诏》。此后，“填”川的农民才络绎不绝。我家祖上提前“填”川，十有八九应该没有皇帝的诏令。作为官方“填”川的中转站，康熙皇帝对孝感乡没有发布前，是不大可能的。那么，家谱上为什么又要说是从孝感乡来的呢？《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要中国人拖儿带女离乡背井，远迁异乡，除非是遇到某种不可克服的难题才可能。这样的难题可能是官府强制，可能是灾荒所逼，可能是贫穷无奈，也可能是带罪潜逃。是什么原因逼迫我家祖上提前“填”川，已无法考证。

四代祖宗长是“由胞伯思福负”入川的。襁褓，背婴儿用的宽带子也。襁褓，就是用带子背着。也就是说，四代祖“填川”时还是婴儿。这中间的问题就多了：婴儿为什么要“填川”？为什么是胞伯“福负”着他“填川”？他的父母呢？他的父母为什么不“填川”？胞伯思福有子女吗？一路“填川”的还有李家的其他人吗？遗憾的是，父亲抄写家谱时把相关内容省略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写明白。不过，听父亲讲过，“填川”时，李家就只有他们叔侄两人，这是祖上一代代口传下来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至少可以推断，“填川”时，宗长的父母已经不在。否则，哪个父母舍得让自己还只能让人“福负”着的儿子前往几千里之外的荒野之地去“插舌为业”？我们不可能知道祖先们当年入川路途上经历过多少挫折险阻，也不知道祖先们“插舌”落户后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但想想也让人背心凉凉。明末清初，四川、重庆经过几十年战乱，人口锐减，甚至几十里几百里都见不到人烟。即使带有若干银两，荒山野岭又去哪儿买吃的、找住的？“插舌”后，没有房屋，没有农具，又靠什么来生活和生产？虽然有史籍记载，清政府也曾向移民发放过种子、农具和耕牛，但数量极少，并不是所有移民都可以得到。因人口稀少，虎患也就极其严重，大白天里老虎竟然可以优哉游哉从通远门走进重庆城来“散步”，农村阔野的老虎当然就会更多。夜深人静，老虎啸叫，会是什么样的毛骨悚然？能够坚守，要有怎样的坚强意志？能够繁衍生息，又要经过多少的顽强拼搏？

●“老屋基”遍布川渝各地

从四代祖（入川第一代）宗长算起，到我为止，已经是九代人。家谱上说，我父亲和我三伯都出生在白鹤屋基，白鹤屋基可能就是我家的祖业。因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说到过，让我记忆深刻。“白鹤屋基”四个字好像还有点诗意，曾经引起过我的联想。我还请人刻了一枚“白鹤屋基”的闲章，作文曰：“白鹤屋基者，鹤去屋崩，乃荒地半亩耳。”推测起来，那地方最早的房屋也许是别人家的，但房屋已经毁坏，只留下屋基。重庆、四川“屋基”的地方颇多，诸如大层基、老屋基之类的四处皆有，估计是明末清初战乱留下来的遗痕。人死了，房塌了，湖广来的移民将就那屋基建房，也可省一笔费用。如今，白鹤屋基还在，位于双龙湖边，一涨水就可能被淹没，因而早就被遗弃。我去看过两次，竟然还留有残垣断壁。只是那里里屋外到处都是野草荆棘，难以下脚。还有就是密密的碗口粗的楠竹，将那残垣断壁几乎完全掩盖起来。站在屋中，抬头望着被竹枝和树冠遮挡的天空，一股说不清的情绪油然而生……



晚清成都裁缝店（资料图片）



晚清市井百态（资料图片）



晚清搬运工（资料图片）

某日亲朋聚会，说到字辈，说到“湖广填四川”。得知我是入川第九代，得知我家字辈“逢春思宗祖，永远大明朝”，全都惊奇。回家再次细读家谱，那动乱年代的虎啸狼嚎又响耳边，先祖们筚路蓝缕“填川”身影又浮眼前……



晚清小镇上的杂货摊（资料图片）



江边的纤夫（资料图片）



晚清集市上的人们（资料图片）